

“挑战”成“夺命”，户外极限运动缘何守不住安全底线

近年来户外极限运动之所以事故频发，是由于越来越多不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参与其中

参与户外极限运动应该有一些知识和体能储备。达到了什么级别，再去参与该级别对应的活动

户外极限运动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不应成为节约社会资源的“绊脚石”，亟须出台法律法规



▲8月25日，李明松(左二)和其他救援人员在关岭县滴水滩瀑布救援。受访者供图

就算遇难者选择的路线没有问题，也不应该进行瀑降，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取消活动。”李明松也是滴水滩瀑降线路的开发者之一。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向外推广。“这条线路很漂亮、很壮观，但穿越这条线对参与者的能力要求很高，还需要很好的领队。”

技能求“速成”

记者采访发现，在户外极限运动培训逐渐市场化后，出现了培训机构盲目开办“速成班”等乱象，威胁该类运动的健康发展。

“这容易误导参与者，让他们觉得户外极限运动很简单。”李明松说，户外极限运动的水平依赖长期训练，速成班仅仅是告之方法。

樊黔建议，在参与户外极限运动培训或相关活动时，一定要选择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或俱乐部。

据他观察，目前市场上部分户外极限运动俱乐部，存在无相关资质、无专业领队、无完备应急预案的“三无”乱象。有些对线路、时间和地点的选择都不规范，甚至出现不购买保险或者购买无效保险等情况。

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超过两成的极限运动培训企业存在经营异常，近3%的相关企业受到过行政处罚。

安徽省黄山山市山越应急救援中心主任于三忠坦言，比起速成班，所谓的“传帮带”同样值得警惕。

“一些‘大咖’或者‘大师’带了很多徒弟。这些徒弟往往不愿意花时间系统学习，认为跟着‘师父’玩两天就能掌握技巧，实际上对器械、技术和理论的掌握都是欠缺的。”于三忠不无担忧地说。

共系“安全绳”

2019年6月16日，59名驴友被困浙江省永嘉县十二峰，经过多方救援力量搜救，才最终全部获救；

2019年8月，深圳蓝天救援队队员许挺秀、尹起贺在广东省惠东县白马山救援野驴驴友时，遭遇山洪失联，最终不幸遇难……

李明松认为，不止一起事故表明，盲目参与户外极限运动，不仅容易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作为户外极限运动从业者，应通过亲身体验，告诉参与者如何正确参与户外极限运动，让他们在参与这类运动中学会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樊黔等业内人士建议，户外极限运动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不应成为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绊脚石”，亟须相关部门出台法律法规，以规范发展。

“国内户外极限运动已经上了快车道，不会因个别意外事故而停止脚步，所以加快规范户外极限运动显得尤为重要。”樊黔说。

编辑 黄海波

本报记者郑明鸿、朱青

8月25日，经过现场搜救人员确认，两天前在贵州省关岭县滴水滩瀑布进行瀑降遇困的两名探险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悲剧的发生，让原本“小众”的户外极限运动，再次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公开资料显示，户外极限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后，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运动类别。与传统体育项目相比，它不仅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强调人们在跨越身心障碍后获得的愉悦感和成就感。

但时有发生的安全事故，让这些危险系数颇高的极限运动充满争议。

专业人士认为，近年来户外极限运动之所以事故频发，是由于越来越多不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参与其中。

此外，随着这类运动热度增加，部分专业培训机构降低标准，开办各类速成班，也是导致户外极限运动事故多发的原因之一。

“小众”的快乐

今年51岁的李明松，还在部队当兵时，他就喜欢节假日背着背包去探险。1991年退伍后，有了更多时间去了解和参与户外极限运动。

“很多项目都玩过，比如探洞、攀岩、潜水等。”李明松说，最近这几年玩得最多的是滑翔伞飞行。

“没有精良的户外装备，就不可能完成高难度的户外极限运动。”在李明松看来，这类运动能充分体现一个国家的体育装备能力，甚至是经济实力。正是受经济因素制约，户外极限运动很长时间内都比较“小众”，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参与其中。

天眼查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极限运动相关企业注册总量，由8000家增长至近3万家，仅2019年新注册的相关企业就有4200家。

拥有近30年户外探险和救援经验的樊黔，是滴水滩瀑降路线的开辟者之一。“在城市的喧嚣和

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向往自然，寻找机会亲近自然、享受自然，这是非常正常的需求。”他说。

“我最开始参与户外极限运动，就是想挑战大自然，希望发现更多的地球奥秘。”樊黔说，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积累，他更享受运动过程中那种融入自然、享受自然、敬畏自然的感觉，“让我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

李明松则认为，户外极限运动可以让参与者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类运动带给了我乐趣、健康，让我能和自然界中很多神奇的景观零距离接触。”

“挑战”成“夺命”

2017年11月8日，自称“中国高空极限运动第一人”的吴永宁，在一次极限挑战中失手坠楼，26岁的生命戛然而止；2020年5月12日，一名女翼装飞行员在张家界天门山进行翼装飞行时，因偏离计划路线失联，最终不幸遇难……

“极限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极限，就是因为它是

对参与者潜能的挑战。”李明松说，参与者在开始运动之前，应进行谨慎评估。如果评估结果不理想，就应该果断放弃，“一次成功的挑战，绝对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贵州省六盘水市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余天亮说，户外极限运动事故，每年都会发生。参与者人越来越多，但欠缺专业技能和知识，是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

“以登山为例，专业培训资源大多集中在各级登山协会，普通人较难接触到专业培训。”余天亮说，部分户外极限运动参与者，往往自我感觉良好，但遇到突发情况时，就没有体力和专业知识完成脱困，“户外极限运动真的需要系统训练”。

余天亮用数据对比了专业玩家和业余爱好者的差距。

前段时间他参加了四川四姑娘山大峰(海拔5025米)速攀比赛。从景区售票处出发，他用时3小时登顶，下山则用了1小时37分钟，全部用时不到5小时。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萌芽”18年仍未“成年”

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目前暂停使用，但各地仍在不停摸索，说明对这个制度还是有需求的

此前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行贿人的惩戒作用有限，“行贿人的日子比老赖还轻松”

需要尽快启动全国统一的行贿人黑名单平台，防止行贿人钻空子，也能避免各自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

本报记者王井怀、谭畅、黄江林

不久前，13家企业、36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被湖南省相关部门列入失信行为“黑名单”并通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再次引起热议。

记者采访发现，这一制度在我国探索18年后仍然没有“成年”：一方面是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目前暂停使用，各地仍在不停摸索；另一方面是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关的惩戒体系尚未健全。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未来走向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

暂停的“黑名单”，不暂停的探索

不久前，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36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被列入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一批失信行为“黑名单”。自名单发布之日起一年内，他们将受到限制从事招标投标活动、取消享受财政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管等联合惩戒。这被外界解读为地方版的“行贿人黑名单”。

“我们正开展专项行动对招投标领域乱象



漫画：曹一

进行系统性整治，对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进行联合惩戒就是措施之一。”湖南省纪委监委政策法规室主任钱胜说，“这个联合惩戒不是直接针对行贿的，但对行贿人肯定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钱胜表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出于案件突破的需要，对行贿人采取从宽的政策，一些行贿人在交代问题后全身而退、安然无恙，有的转身又故技重施、毫不收敛。“很有必要多措并举，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力度。”他说。

长期在一线办案的执法人员和专家估计，“查处10起贿赂案件，只有2起是行贿案”。为此，我国近年来一直探索对行贿人的惩罚机制，其中就包括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行贿人黑名单自2002年由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率先推出以来，至今已有18年时间。

2012年，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即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不过，记者日前查询发现，这一查询系统已经暂停服务。

海南等多地检方，在2018年发布通告称，接高检院案管办通知，自2018年8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停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通知详细解释道：(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中)反贪部门从检察院转隶到纪委监委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已与检察职能不符，检察机关掌握的行贿犯罪档案记录和行贿信息已不完整，客观上无法提供全面准确权威的行贿犯罪档案和行贿信息查询，基于以上原因，行贿档案查询工作不宜继续开展。

对此，记者分别联系东部某市和中部某省的检察院和纪委部门，检察院表示不清楚目前该系统的运行情况；纪委部门解释说，该系统并未随机

构改革转到本部门。不过，各地对行贿人黑名单的探索并没有停止。

近年来，海南省对医疗领域商业行贿不良记录实行动态管理和公示；福建厦门集美区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库”，并与村两委班子成员选举挂钩；国家医保局也拟建信用评级，药企商业贿赂等行为将被纳入黑名单。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对净化腐败土壤起到很大作用，各地不停推出新措施，说明对这个制度还是有需求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孤独的“黑名单”，撑不起的惩罚

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已经暂停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还是各地正在探索的黑名单制度，与之相配套的惩戒制度显得更加滞后。

曾在检察、纪检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介绍说，此前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行贿人的惩戒作用有限。

一方面，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录入的大多是已经判决的案例，一些行贿人已受到处罚，大多离开相关行业领域，“相关部门期望这一系统对行业内的企业或个人进行甄别，意义有限”。另一方面，在现实执行中，一些主管部门要求企业“自证清白”，必须出具“无行贿记录证明”才能参与相关工程，无形中反而增加了企业负担。

庄德水介绍说，即便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惩罚，企业也容易“金蝉脱壳”。几年前，东部某市检方对“行贿犯罪档案”中3家犯有单位行贿罪的企业进行跟踪发现，其中有两家重新成立了新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原先“犯事”的公司实际上成了一个空壳。

同时，一些专家指出，在政务数据资源领域，一些部门、行业对行贿人、行贿企业相关情况等信息共享的权属观念较重，客观存在数据壁垒、信息孤岛等现象。这些都导致了行贿人黑名单难以有翔实的权威数据作为基础。

钱胜认为，如果不能对行贿市场主体进行

有效惩戒，他们很可能“华丽转身”，继续行贿，再次对政治生态形成污染。

行贿人的日子比老赖还轻松？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雷勇等专家公开表示，与受贿犯罪相比，过去一段时期行贿犯罪查处相对少一些，影响了对贿赂犯罪的整体打击效果，“行贿犯罪是贿赂犯罪源头之一，对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正义危害巨大”。

庄德水等专家也认为，老赖上黑名单后，生活受到各种限制，但行贿人上黑名单后，金蝉脱壳后还能照常过日子，需要加大对行贿人的处罚。

多位专家表示，需要尽快启动全国统一的行贿人黑名单平台。目前各地自建黑名单制度，由于信息互不联通，容易让行贿人钻空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新平台应该利用大数据技术，与公安、检察院、纪委、工商等系统对接，对目前的全国性统一行贿黑名单进行扩容、升级。”庄德水认为，新的黑名单不应该只有查询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大数据对行贿的重点行业、环节等特点进行全方位分析，为预防腐败提供决策支持，使之成为反腐利器。

同时，加强对公司股东身份的审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管友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善公司、企业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公司股东真实身份和资质的审查，建立统一并联网的诚信档案，将诚信档案记载的诚信度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门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防止行贿人一再借壳开设公司而“复活”，最终让行贿人在各方面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配套的支撑体系。彭新林认为，在大力推行黑名单制度与市场准入、贷款、信用评级等制度衔接的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建立合规制度，引导企业把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纳入企业合规管理之中，为企业行贿上黑名单设立一道防火墙。

编辑 黄海波